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

□ 赵宏勃

丝绸之路是历史，丝绸之路也是现实。最近，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一带一路”建设耳熟能详，这是中国推进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标志。

贯通欧亚大陆两端的道路

众所周知，给丝路冠名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877年首次提出这个名词，其后得到历史学家赫尔曼的响应，逐渐被学术界接受。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探险家在对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察中，发现许多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遗物，丝绸之路的概念借由他们的著作传播开来，如今，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超出最初定名时的空间、时间及承载物范围，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然而，在被命名之前，这个将中国文明与西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早已存在。如果去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参观，一定会惊叹商代玉器的精美，其实，商周玉器并非产自内地，极有可能是由西戎民族贩运而来。如此看来，最初，丝路可以说是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张骞凿空的壮举，打通了西域，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商路，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在这个路网中，此前波斯帝国时期和马其顿帝国时期建造的驿道、城池起着重要的作用，构成丝绸之路的西段。在这条漫长的商路上奔忙的商人主要是塞种人，到了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在隋唐时期，商胡成为文献中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在诗歌里，胡姬则是流行的主题。宋代重海上贸易，13世纪以后蒙古诸汗国建立，鼓励四海通商，东西方贸易更加活跃。从交通路线发展和交换商品情况来看，这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渐渐活跃起来，出口的瓷器比重增加，进口的香料也开始多于珠宝，形成一条“香瓷之路”。

到了15世纪，随着拜占庭的灭亡，丝绸之路受阻，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商人垄断了丝绸贸易。欧洲人开始的大航海事业，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直接走向东西贸易的前台。14世纪以后，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他的游记成为关于亚洲的重要记录，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都是这部奇书的忠实读者。《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启发葡萄牙著名的航海王子亨利绘制航海地图的重要参考书。

明朝初年郑和的航海事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远达东非，但是他的航

海事业结束之后，也意味着传统海上丝路贸易的绝响。在这一时期，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却基于亨利王子对航海科学和海洋知识的探求，迅速发展起来，他派遣的葡萄牙船舰，到1460年时，已垄断了从直布罗陀到几内亚长达3500公里西非海岸的航路贸易。与郑和船队的政治目标完全不同，对明朝来说，贸易经营是巩固政治互信的手段，只是为了引导南海各国前来朝觐。

1498年，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开始打破丝绸之路的中端垄断权，之前的垄断者是控制波斯湾贸易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以及控制红海的意大利商人。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西方市场，在太平洋上扬帆的著名的大帆船，主要输送来自明朝的大量商品，瓷器、丝绸、茶叶大量外销。而欧洲人没有奇珍异宝足以平衡，19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形成以毒品换取商品的结构，必然导致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最终使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中国以被动的姿态打开国门，沉重地迈出中世纪。

来往于两个平行空间的人们

丝绸之路的历史悠久，贯穿着上古到现在，其间也夹杂着不同文明的特质与发展的取向。张国刚教授的新书《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以丰富的史实、生动的文笔，将丝路的过往娓娓道来，既包含着丝路，又不仅限于丝路。

全书依时序回顾了自上古到明、清中叶这条中西通道上的风云变幻，其中的知识容量极为丰富，涉及人物、器物、技术、艺术等多方面，通过缜密的分析，以丝路折射出不同文明交汇的关节点，阐述了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丝绸之路之上，商品、器物的流动是历史悠久、品类丰富的，关于器物，书中用整整一节总结了在丝路上古往今来的物质交换情况：在多数时间中，都是中原以手工艺品、农产品的丝绸、瓷器、茶叶，换来域外的“珍宝”。从汉代汗血马的神奇传说，到唐代的胡商献宝故事，再到明代官宦人家嗜好珠宝收藏的传统，都反映着这种交换的单向度特征。

除了物品之外，丝绸、瓷器制造技术，乃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外传以及在域外的发展情况，也在作者描写的视野内。

从上古到清朝，丝绸之路上的值得书写的人物、事件不胜枚举，在

这个方面，作者的选材颇具匠心。比如，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除了笼统地称之为商胡，有没有更多的史料为他们画像？又有哪些考古学家津津乐道而不为普通人熟悉的材料呢？作者用富有说服力的史料、浅显的文字介绍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知识。如在楼兰城郊的一座东汉古墓中，出土了丝绸残片、汉代的五铢钱、希腊的彩色毛织物残片，上面的头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一位手持信件的使者神。又如汉语的“琥珀”一词出自叙利亚文，“珊瑚”则出自古波斯语。这些知识点滴都为理解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提供了佐证。

对于见诸史籍中的诸多胡人，以及在丝绸之路上西游的著名人物，如张骞、甘英、法显、玄奘等人，书中除了对他们的事迹进行梳理，在作者条分缕析的描写中，点明了这些重要人物的作为与付出的卓绝努力，以及个体的壮举与时代背景的关系，令人茅塞顿开。这些阐述使历史人物变得立体而真实，那些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也通过对人物的评述越发清晰。

及至16—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担负起重要的使命，他们带来西方的地理知识、天文仪器、计时仪器、乐器等，期望以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这些激起了部分士人、官员甚至皇帝的好奇心，但没有也无法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潮流。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却能对所接触到的片面的中国知识加以利用，促进社会转型。

同一条通道，对中国和欧洲的影响完全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域外之地输送的各种珍奇是有吸引力的，但对“西域”“西洋”“泰西”，并无仔细打量的兴趣。16世纪初，明朝官员开始接触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但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名称甚至都没有兴趣弄清清楚。与此同时，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却在不断变化，到了18世纪后期，中国开始被作为“非印度”而关注，西方认识到以中国内地为核心，包括朝鲜、日本、中南半岛的儒家文明圈的存在。最终，中国文明成为了“东方”的本质特性，这个确定是对中国地理位置、文化和宗教特征认识清晰的结果。

文明互鉴推动进步的动力

回到在丝路上开展的中欧贸易，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历了

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的历程，中国物产从食物、矿产、家居用品到玩具都很受欢迎。17—18世纪的欧洲钟情于“中国趣味”，在室内装饰、园林景观等方面有大量对中国元素的文化借用。在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中国趣味是异国情调的重要代表，上流社会以收集和展示中国瓷器为时尚。18世纪初，茶叶成为英国人的社交生活新宠。到1722年时，对茶叶的进口价值已经超过了丝织品。到了18、19世纪之交，饮茶的习惯在英国普及开来，就连产业工人也依赖茶叶来消除疲劳，支撑辛苦的工作。

中国文化与欧洲不可忽视的巨大差异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中，如棱镜一样折射着欧洲人的需要。16、17世纪，欧洲人试图寻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似性，对中国的评价以赞扬为多；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作为“他者”的特征突显，关于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看法，也被19世纪以后的欧洲学者继承，他们将中国文明的价值定格于“历史性”这样单一的角度，停滞的特征被格外强化。由此可见，欧洲总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不断对他者进行“误读”，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惯性。

从梳理、解说丝绸之路的常识入手，本书不仅提供饶有趣味的历史知识，热点话题背后的历史真相，也立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效果，思考由此而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共同的命运，恰如历史上羌笛驼铃络绎不绝、天方海舶不畏远途。本书钩沉史实，缜密书写，为读者了解这一恢弘、壮阔、悠久的历史交流史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挥史笔、说文化，古往今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莫不来自历史的源流又受到现实的深刻影响。钩沉丝绸之路上的史实，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历史的陈霜，更是在回望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时，清醒地认识到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这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动力。《胡天汉月映西洋》一书，梳理了自上古时代到大航海时代以来丝绸之路这一重要商贸通道的历史，为理解今日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历史的深度与文化的广度视角。一言以蔽之，“丝路沧桑三千年”就是文明交流的历史。



营商之信

□ 王 涛 车 耳

提起红顶商人，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胡雪岩，其实在晚晴还有一位比胡雪岩官衔还高的从一品滇中富商，他就是王炽，民间称为“钱王”。百余年来，在彩云之南的昆明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关于“钱王”的商业故事。

那是清末的一日，空气中阴雨绵绵，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熙熙攘攘，一片忙碌的气息。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一个六七岁蓬头垢面的孩童迈入大堂来到柜前。店内许多小伙计正在忙着算账，其中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瞥见他们，头都没抬一下就问：“存钱吗？”老人枯树皮似的双手颤巍巍地捧上了一枚油迹斑斑的铜钱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想给他存点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呵斥道：“一枚钱太少，攒多了再来吧。”老人低声哀求：“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他苍白的须发抖动，面含悲色。但是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信义天下”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庆丰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引起了同庆丰客户们的惶恐，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客户纷纷涌到同庆丰提取银两并存到别家钱庄。事发突然且急迫，大东家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找到原因后，他痛心疾首道：“人无信，不可立呀。”于是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将他们所拥有的一文钱设立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

这时，人们才对同庆丰的误会渐渐消除，并对王炽的表现深为钦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信用有加，不愧为商坛巨擘，于是大量的银子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同庆丰钱库。在那个没有多少法制和金融体制保障的社会，王炽的这一英明之举挽救了他的商业帝国。多年之后，他也因其财富被《时代周刊》列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

在这个故事中所涉及的信用问题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狭义”信

用，具有典型的委托代理机制和信托业务关系。客户（花甲老人）委托金融机构（同庆丰钱庄）代为管理自己的财富（一枚铜钱），同时指定该信托的受益人（自己的孙子）。而在这种间接融资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的透明度较差，尤其是在晚清非市场经济体制中，商业信用关系更加不稳定，需要多年的企业诚信积累才能产生充分的市场信誉。那么在这么一笔钱庄伙计看来“无利可图”、无关紧要的业务中，违反了企业诚信原则中的诚实和考虑客户利益的原则。事件经过传播发酵，使企业客户与潜在客户在无法量化钱庄财务与管理能力的情况下，根据这一孤立事件对钱庄的管理服务能力与诚实品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继而动摇了业务经营的根基。钱庄管理经营的“老江湖”王炽在了解这一事件后，马上意识到该事件对企业核心信用的严重影响，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干预措施挽回钱庄“无形资产”——商誉的损失，避免了商业挤兑风波进一步蔓延。这也成为企业信用管理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来看这个故事。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信用是信用体系的主体，对于企业信用的考量除了需要量化分

析企业的履约能力还要评估企业的履约意愿，也就是对企业诚信做出判断。借用《区块链革命》中的理论，商业领域中有“诚信四原则”，这四条原则是：诚实、考虑对方利益、承担责任和透明性。首先，诚实并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企业想在员工、合作伙伴、客户、股东以及公众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企业就必须诚实、准确、完整地将与各方交流。企业不能通过忽略某种事实的方式撒谎，或通过增加事情的复杂程度以达到混淆细节的目的。其次，考虑对方利益通常是指交易方会诚心诚意地进行价值的交换或让渡，而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建立在对各方利益、需求及感受的考虑上，需要彼此间心存善意。再次，承担责任，意味着对利益相关方做出明确的承诺，并严格恪守这个承诺。个人和机构必须展示出他们有信守承诺并承担违约责任的决定。最后，透明性意味着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运作。若市场上有“他们在隐瞒什么事情”的想法时，就说明企业运作的透明度不高，最终可能会失去外界的信任。

信用故事



秦与农有不解之缘。秦的远祖伯益，后代封国为秦。按说文解字所释，秦其实是两个字的组合，上半边是“春”的省略，下半边是“禾”，这些都和农业生产紧密相连。也有人认为，“秦”是一种禾谷的名称。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证明秦自古重视农业。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都一丝不苟，以农为本成为秦的悠久传统，也成为秦崛起的坚实基础。

垦草令

如果说秦重视农业源于自发自觉，那么从商鞅变法开始，农业和农民的事情就成为了国家的头号大事。《垦草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颁布的，把农业提高到“以农为纲，以粮为纲”的高度，其意义比徙木立信更加深远。

《垦草令》没有就农业谈农业，开篇直接是“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这抓住了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官员绝不能拖延政务，有事不过夜，官员忙起来，农民才能有富余时间，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梳理清楚治理和发展的逻辑关系，秦国整体成为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为农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大环境。

以农兴国，必须以农为贵。商鞅之后，农战一体，务农和从战一样受到尊重，一样能够显荣。秦放眼天下，将农战之策发挥到极致，不仅有兴农之法，还有惠民之策，不仅激发本国人投身农业，还吸引六国移民入秦务农，秦成为农业人员和技术的汇集之地。国唯农是举，民有利则喜，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秦成就为当时农业的理想国，也成为天下粮仓，富超六国。

实验之田

种田也有春天，谁不想多收个三五斗？一切智力和能量都被动员到田间地头。什么收成好就种什么，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动力，秦国的主粮品种在不断尝试中推陈出新。巴蜀的水稻带来了惊喜，还有小麦，也是秦国农业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

学界对于中国小麦的起源还有不同看法。但无论从古代文献还是考古发现来看，中国都应该是小麦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变种繁多。安徽亳县钓鱼台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碳化小麦颗粒。《吕氏春秋·审时篇》中记载，“得时之麦，梗长而穗黑，其柱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满足这些特征的就是小麦。秦地处西方，很有可能最先关注小麦，并将本土小麦和外来品种进行了综合改良。成书于秦昭襄王时代的《日书》，对于种植小麦有明确指导，也说明了小麦在秦国农业中的重要地位。

战国末期，北方的主粮品种还基本都是小米，也就是谷子和糜子。这些作物虽然耐旱，便于管理，节省人力，但是产量不高。小麦对灌溉的要求较高，但是产量也高。如果能够解决水的问题，那么小麦就是不错的选择。在这件事情上，韩国帮了秦国一个大忙。

飞来横福

秦王政继位不久，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肩负拖垮秦国的使命，不辞辛劳远道而来，建议并主持为秦国开凿一条东西走向、长达300公里的水渠，沟通西边的泾水和东边的洛水。郑国可能不是一位合格的间谍，但是绝对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水渠设计科学，施工严谨，干渠主体正好位于渭北平原二级阶梯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地势条件，可以由北向南辐射干渠南部整个区域，于是“关中



榆次遗址中发现的西周碳化小麦颗粒

农业之国

□ 崔 庆

为沃野，无凶年”。

水多了，对于谷子糜子意义不大，但对于小麦，那就是“及时雨”了。得到充足水量的关中平原，可以成为种植小麦的基地。这是韩国人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小米”时代，自以为奇计得逞，岂不知正中秦国下怀，“为秦造万世之功”。

郑国渠为秦国土增加了4万顷良田，可以种植小麦，获得高产主粮。按照“亩产一钟”测算，这片土地可以供应50万至60万人的口粮，这个数量接近秦国所能动员兵力的上限。在本土核心区，有可以维持主力部队的农业基地，没有比这更让秦国欣喜的了。郑国计划败露后并没有死于秦国，水渠反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基本相当于被评为了秦国劳模，永世纪念。

创新中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种田也需要有称手的家伙和得力的帮手，在这方面，秦不遗余力，舍得花钱。从秦简考古发现，战国晚期开始，秦国已经开始大力推广铁质农具，推广使用耕牛，这在当时都算是“高科技”和重大创新。

睡虎地秦简《厩苑律》规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这就是说，如果农民向官府借用铁农具，发生自然磨损，只要备案，说明上报，不必赔偿。都说秦法苛严，细节之处却充满了人性关怀。铁质农具在当时可便宜，秦国的兵工厂除了生产武器，还会生产农具，满足军民两用。铁质农具坚硬、锋利、轻巧，翻耕土地不仅快，而且深均，非常有利于农户提高生产率，扩大种植面积。

秦大量使用耕牛也使农业如虎添翼。秦原本就是畜牧大国，擅长饲养大型牲畜，马养得好，牛也养得好。《战国策》曾记载赵国重臣赵豹的观点，“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土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推广耕牛，使原来不易耕作的土地都成了沃野，因此赵豹认为不能轻易和秦国开战。可见，秦国农业发达，成为了六国心病。

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秦国圆满解决了这些问题，农业大大改观，“秦富十倍天下”。随着农业发展，秦国的饮食习惯潜移默化地转变，因有小麦，国人渐渐喜欢面食。墩饼、锅盔等主食容易储备、运输，经久不坏，舌尖之选成为秦军优势，作战方式也悄悄改变。由于粮食储备充足，食用简单又便于运输，秦军有底气打大战、打硬战、打持久战。无论是长平之战，还是灭楚之战，都耗时长久，秦却稳如泰山，收放自如。

由牧转农，以农兴战，是产业结构转型，也是举国发展的策略蜕变，为兴霸之路提供了坚实基础。变则通，通则聚，聚可兴。万事皆可变，不变的是振兴家国的雄心。